



香港回歸 與 港臺關係

王家英 孫同文 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回歸與港臺關係

王家英 孫同文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1997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三十七號

香港回歸與港臺關係

編者：王家英 孫同文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版次：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62-441-537-4

© 香港中文大學 1997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隨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臨近，香港即將結束長達十四年的過渡期，正式從英國的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主權統治，並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行「港人治港」。

儘管香港的政權轉移與交接早已開始，而且迄今為止，一切均大致在穩定有序地進行，但「一國兩制」畢竟是一歷史性的、未經實踐的構思，其是否能如預期般成功運作，仍須有待「九七」後一段頗長時間才能驗證。亦因為如此，特區政府如何因應香港新地位的來臨而制訂恰如其分的各種政策，以確保「一國兩制」的落實和促進香港自身發展空間的開展，將是未來「一國兩制」實踐成敗的重要關鍵。

這尤以港臺關係為然。由於兩岸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之中，香港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回歸，勢必將複雜矛盾的兩岸關係帶進於當前的港臺關係之中，使得港臺關係較諸香港與其他地區的關係，蒙上了更多的不明朗陰影。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來，香港對於涉臺事務的處理，均由英國外交部直主其事，香港政府並沒有獨立處理港臺關係的經驗與機制，故此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涉臺事務上無可避免地從零開始，進一步加深了未來港臺關係的不明朗性。

有鑒於此，今年初我們分別從大陸、香港、臺灣邀約了一些熟悉香港問題及港臺關係事務的學者撰寫論文，按其專長的題目，作出深入的討論、分析，並盡量作出可供特區政府和兩岸當局參考的政策建議。

現在，這些論文終於撰寫完畢，結集出版了。我們特別感謝各位作者的支持與努力，沒有他們，這本論文集是不可能面世的。我們更衷心感謝香港崇正總會為我們慷慨捐出出版經費，這已是繼去年底資助我們出版《兩岸關係的矛盾與出路》之後的第二次。香港崇正總會持續地關心民族，努力國是，支持文化，值得我們的肯定與讚揚。最後，我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及其全人接納此書的出版和安排一切出版事宜。

香港「一國兩制」的回歸是中國的歷史性大事，其成功與否仍有待我們在學理、政策和各方面的不斷努力。而港臺關係作為香港涉外關係的一個極重要組成部分，其維持和進一步發展，自然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成敗息息相關。這本集子的面世，代表我們對有關問題的關懷和看法，它一方面提供執政者和社會人士參考，另一方面藉此拋磚引玉，以引發各方人士對有關問題更積極、更有意義的討論，從而推動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能朝其所預期的理想方向發展。我們是抱著這種心情編寫這本書，也期望著各方的批評和賜教。

是為序。

王家英

孫同文

一九九七年六月

香港回歸與港臺關係

目 錄

序	vii
1. 導論	王家英 孫同文 1
2. 「一國兩制」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的 具體運用	辛 旗 9
3. 臺灣與香港關係的過去、現狀與前瞻	譚志強 27
4. 香港特區政府處理涉臺問題的法律與政策 依據探析	羅祥喜 55
5. 臺港關係芻議	葉明德 75
6. 香港特區政府的涉臺關係政策： 空間與方向	王家英 85
7. 香港在兩岸關係中自主性的初探	孫同文 107
8. 香港人對待兩岸三地關係的態度與變化	王家英 127
9. 香港與中國人的文化挑戰： 關於「九七」回歸的省思與期盼	石之瑜 151
10. 臺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及其對香港 的影響	吳若予 177
附錄一：中央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年後香港涉臺 問題的七項基本原則和政策（「錢七條」）...	201
附錄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203
作者簡介	217
鳴謝	219

第一章

導 論

王家英 孫同文

香港將於七月一日正式回歸中國主權，結束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看，香港的回歸無疑對整體的中國人帶來重大的鼓舞，因為香港自中國的割裂出去，首先掀起了西方帝國主義侵凌中國的序幕；而它的回歸，不僅是對這一段歷史一個公正的交待，而且更象徵中國近百多年來飽受殖民主義欺壓的苦難的終結。更何況，今天的香港已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國際城市，衣錦還鄉，不論對中國的國勢、中國如火如荼進行的現代化，以至於兩岸未來的和平統一，均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積極作用。

然而，必須指出，香港的「一國兩制」回歸畢竟只是一個新歷史的開始，其真正的成功仍有待時間的檢驗，尤其是其在中國未來現代化和兩岸和平統一的角色，還有待我們本著理性務實的態度去探討、摸索。如序言所說，本書的出版，就是集合一些中港臺三地的學者，在香港回歸前夕，對香港回歸的經驗、地位、法律規範和未來的應走方向作出思考和分析。

由於人員、精力和時間的限制，全書較偏重於香港回歸對港臺關係所可能帶來的種種衝擊和變化，也因此簡單地將之命名為《香港回歸與港臺關係》。無論如何，在既有的限制之外，這樣的偏重也有其好處，因為兩岸關係仍處於較低迷的境況之中，而且仍未建立起良性互動的機制，使得回歸後的香港與臺灣現有的關係及相關發展難免因兩岸關係的扞格存在了較多的不明朗因素。有關港臺關係未來動向的分析和探討，自然有較重要的時間意義和迫切需要。

全書除本章外，共分九章。茲將每章內容摘要如下。

第二章辛旗的論文扼要地分析了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戰略構思形成的背景和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並深入地整理出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問題談判中各自的策略運用。辛氏指出，「一國兩制」構思產生的背景在於冷戰後期的緩和潮流、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基本國策、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國內環境、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外交影響力的不斷擴展和香港市民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渴望等。基於上述背景，中國政府構思了「一國兩制」作為其與英國政府就香港問題談判的基本方針，以求務實地在照顧中國、香港和國際社會多邊利益的情況下，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在談判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把握住香港問題的幾個基本的、實質的和特殊的面向，包括：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長期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中華文化仍佔主流；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並仍生機勃勃；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和國際金融、貿易、物資中心；香港是一個國際大城市；香港是中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文化聯繫的重要基地和重新打開的大門。對這些面向的把握，使得中國政府能在談判中方向正確地迫使英國政府逐步接受以「一國兩制」的原則解決

香港回歸中國問題，一方面維護了中、英、港以至國際社會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為世界奉獻了一種解決和處理國際爭端、歷史遺留問題的新模式。

第三章譚志強的論文是從兩岸關係的歷史背景看港臺關係的過去、現狀與未來。譚氏指出，長期以來，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而其中一個「充分利用」的功能，乃通過臺灣駐港機構與人員，以及香港親臺勢力與臺灣建立種種對「中國統一」有利的關係。這種政策方針，迄香港的「九七回歸」明朗化之後，仍沒有太大的改變。相反，臺灣對港政策則有點混亂。早期偏重於利用香港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但隨著「反攻大陸」希望日漸渺茫，老一輩親國民黨人物的逐漸凋零，和香港「九七回歸」的明朗化，臺北逐漸調整其對港政策，一方面淡化與親臺人士的連繫，另一方面努力推動臺灣駐港機構往合法化、功能化方向發展，以盡量減低香港政權轉移對臺灣的衝擊。譚氏認為，總體而言，由於兩岸雙方對臺港關係均展現了相當務實理性的態度，「九七」後臺灣駐港機構存留應不成問題，反而香港親臺社團或個別的親臺人士，也許會在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作出一些令香港特區政府、臺灣政府和北京政府尷尬的事情（如懸掛青天白日旗等）。

第四章羅祥喜的論文從法律與政策的角度的角度，詳細地探討了香港特區政府處理涉臺問題的依據。根據羅氏的分析，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涉臺問題時，受到兩個重要文件的規範，一是香港《基本法》，另一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代表中國政府宣布的《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後香港涉臺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簡稱「錢七條」）。羅氏認為，《基本法》已可用於處理

大多數的涉臺問題。在香港境內的臺灣人士、臺灣駐港機構的活動、臺灣人的企業和資金、親臺社團等，特區政府完全可依《基本法》及香港的其他法律對其活動和權益進行規範和保護。至於香港與臺灣地區之間的各種關係，《基本法》的規定不夠明確、具體，但也無明確的限制或禁止，特區政府可根據其一般性原則或其中的一些一般性授權，直接或透過中央政府具體授權來處理有關問題。然而，羅氏也同時指出，《基本法》並不能用來處理香港所有的涉臺問題，而「錢七條」正是針對這一點而制訂的。羅氏解釋，「錢七條」雖不是法律，但對特區政府處理涉臺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不僅確保了「九七」後港臺民間交流交往的持續發展，也妥善處理了臺灣駐港機構和人員的存留問題，而且更間接允許了「九七」後港臺兩地可有某種形式的官方接觸。最後，羅氏語重心長地表示，香港特區政府要比較妥善地處理好涉臺問題，除了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基本法》和「錢七條」之外，還需要全面了解港臺關係的基本情況及其特殊性，以及臺灣的對港政策，明確自己應該及可能扮演的角色，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有效的處理涉臺問題的機制。

儘管在處理涉臺問題上香港特區政府有《基本法》和「錢七條」的指導和規範依據，但「九七」後的港臺關係畢竟只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這組成部分有很高的特殊性，因此兩岸關係的演變自然對港臺關係構成極重要的影響。第五章葉明德的論文是從臺灣學者的角度觀察未來港臺關係的走向，並向兩岸三地的執政者提出一些具建設性的政策方向。葉氏認為，北京政府雖制訂了「錢七條」和《基本法》規範未來港臺關係的發展，但迄今為止，北京哪些機構負責處理、協調港臺關係、如何分工等仍未明朗，因此未

來港臺關係的發展，仍存有不少變數。無論如何，葉氏建議，要維持港臺關係，以至利用港臺關係促進兩岸關係的良性化，北京方面應以港臺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試點，以引進臺灣經濟力量推動香港的繁榮，並藉此顯示北京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誠意；香港方面應調整「寧左毋右」、過於偏差的態度，並在遵循《基本法》的精神下，賦予港臺關係較充裕靈活的空間；臺灣方面應謹慎處理臺港政治關係，並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積極嘗試開拓臺港關係的空間。

如果葉氏的論文多少代表了臺灣觀察港臺關係的角度與立場，第六章王家英的論文則反映了香港學者對特區政府處理港臺關係的觀點與建議。與葉氏所見相近，王氏認為未來港臺關係的發展，深刻地受到兩岸政府對待港臺關係的政策所制約、影響。王氏特別指出，從政策的角度看，兩岸政府對未來臺港關係各有企圖也各有底線。一方面，北京的最高目標是希望將港臺關係定位為中國內部特殊地區與特殊地區之間的關係，這將有利於其推動「一國兩制」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模式，而其底線則是不讓臺北利用港臺關係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效果。另一方面，臺北希望在港臺關係上確立其不從屬於北京的「對等政治實體」地位，而其底線則是不能被北京「矮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政府。不過，在這些最高的目標與最低的底線之間，兩岸政府基於港臺關係所涉及的龐大利益，還是十分希望港臺關係不會因政治原因而不能過渡。這樣的取態，使得未來特區政府在處理涉臺關係上有一定的空間可以發揮，那就是在兩岸的政治底線之間尋求香港利益的極大化。而要達到這目標，王氏認為特區政府在處理涉臺關係上應堅守如下原則：以香港利益為本；盡量避免從兩岸政治矛盾的角度處理其涉

臺關係；以法律規範港臺關係；建立和強化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對香港的涉臺事務的制度性溝通與政策共識；爭取中央政府的同意或授權以推動港臺互設統籌機構；積極成立香港的兩岸關係和港臺關係研究機構以提供長期性的政策研究、規劃、分析與建議。

第七章孫同文的論文是從兩岸關係的背景探討香港所可能扮演的積極角色。據孫氏分析，一直以來，不論在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香港均被兩岸視為一種過渡性工具處理，用作統戰對方、發展各自的經濟、協調兩岸一時還無法解決的政治矛盾等等。與此同時，香港也憑藉其獨特的中介橋樑角色，發展出強大的社會經濟實力。孫氏因此認為，為了擺脫其工具性地位的宿命，更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在「九七」後，香港特區政府應該積極發揮其自主性，在不違反北京既定政策的有限範圍之內，一方面擴大與國際社會的交往，增進經貿關係，形成維持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安全網絡；另一方面透過正式或民間團體的聯繫，主動地與臺灣增進經貿和社教文化的交流，強化弱勢兩角結盟的經貿互利體系，並且協助創造大陸與臺灣在香港開展良性互動模式的活動環境。

第八章王家英的另一篇論文利用電話調查，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了香港市民過去一年來對大陸、臺灣和香港三者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和變化，替三地的決策當局提供了有用的參考。王氏的調查發現，今年香港市民與去年一樣，對大陸人仍較為認同，對「九七」後港臺的關係則較去年稍微樂觀。經濟上他們雖然傾向認為港臺之間互補和競爭兼而有之，但還是希望現時臺灣駐港機構的活動能在「九七」後繼續下去，希望港臺關係在「九七」後仍能繼續發展，也不認為臺

灣積極籌建的亞太營運中心有足夠能力挑戰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資訊中心地位。相反，他們甚至相信有關的籌建會對兩岸關係和港臺關係發展有利。至於兩岸關係，今年香港市民的態度似乎沒有去年消極，但仍與大陸較為接近，大多認為臺北當前的大陸政策與外交政策不利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希望兩岸早日達成「三通」。此外，今年港人對臺北的統一承擔存有較多的疑慮，但對北京以「一國兩制」統一臺灣的模式信心也相對減弱，也許因為如此，他們對兩岸和平統一仍顯得十分審慎，儘管已較去年稍有改善。此外，大多數香港市民既反對臺獨，也反對北京用武力解決兩岸的統一問題，於此亦可窺見香港市民對兩岸關係的矛盾複雜態度。

第九章石之瑜的論文處理的是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應有文化政策。石氏認為，一個好的「九七回歸」政策必須處理好文化上的調適過程，讓香港文化的發展逐步擺脫後殖民主義的困擾，並與中國母體文化的復興之間，培養出相互滋長的脈息。石氏深思地指出，香港回歸的終極意義是文化回歸，文化回歸的價值在於能促進文化創新。為此，特區政府必須克服但求穩定、商業優先的心態，才能本於人民精神面對中國，營建合適的氣氛，讓大陸人民得以欣賞多重文明的香港所帶來的文化產品，激勵香港人率先享受並超越現代中國的後殖民情境，在世界文明已然交匯的條件下，探索真正屬於中國人文化成長的潛在途徑。要達到此目標，石氏特別向特區政府未來的文化政策提出若干具體建議，包括成立社會大學巡迴工作坊、成立代留學考察計劃、成立藝文實驗基金、作出多文明的教育規劃、成立後殖民文化協作中心和推動藝術行政的委員會化等。

最後一章是吳若予的論文，討論的是臺灣近年積極籌建的亞太營運中心及其對香港的影響。吳氏認為，籌建亞太營運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是透過臺灣既有的發展基礎，擔任引領先進產業資本進入亞太後進國家發展市場的橋頭堡，藉此建立「先進國家→臺灣→亞太後進國家」三者垂直整合的產業發展形態，使臺灣能積極參與亞太發展而同時受益；另一方面是透過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所形成的區域產業分工關係，支撐臺灣全方位國際政經發展戰略的動力，藉此建構臺灣與各國間實質關係的開展基礎，以及藉由國際形勢的客觀力量避開來自北京的可能政治阻力，從而確保臺灣的安全與國際生存發展空間。吳氏認為，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後，透過港臺經貿合作關係將使得亞太區域中的產業分工機能，不管在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上都更為強化，而有利整個區域的發展，使得港、臺雙雙得益。因此，吳氏建議特區政府針對臺灣「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思，作出配合性的政策措施，包括協助具有資格的港商，積極參與「亞太營運中心」之各項「策略聯盟」計劃，以強化臺、港在亞太區域間的產業分工關係；保障臺商在港的正當商業、投資利益，確保其不受兩岸關係影響；維持臺港直航關係，避免香港成為北京與臺灣協商各種兩岸關係架構的政治籌碼；以及積極參與區域性政經安全架構，以維護香港本身在「九七」後的穩定安全。

第二章

「一國兩制」在中英香港問題 談判中的具體運用

辛 旗

引言

今年香港成爲世界的焦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政府將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在經過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統治之後，香港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香港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英國侵佔了中國的領土香港，中國作爲一個主權國家，主權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中國有權收回自己的領土，並自行選擇收回的時機、途徑與方式。長期以來，由於歷史、國內、國際諸多複雜因素的影響，中國政府採取妥善方式與英國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一直不成熟，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爲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創造條件，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中英通

過一系列談判，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妥善地解決了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是「一國兩制」理論在處理國際間歷史遺留問題上的成功運用，有著處理國際間大衝突的國際法意義。

中國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原則立場 和特殊的策略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始終堅持反對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的立場，但在策略上則主張既考慮歷史背景，顧及冷戰中英對華政策與美國有所不同的情況，採取靈活的策略，掌握戰略的主動。建國初期，保持了與英國的對話，突破美國對華「新月型包圍圈」，在中國的東南沿海開闢了一條與西方國家聯繫的通道。一九五四年八月，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的主張，指出「香港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時機不成熟時「不要去談」香港問題。¹

冷戰中期（1959-1969），中國面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重軍事壓力，香港作為中國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開展進出口貿易的窗口，聯繫海外華僑及國際民間力量的橋樑，作用十分明顯。毛主席在接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說，我們現在不談香港問題。一九六零年，中央對港澳工作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²為經濟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國政府首次聲明，對港澳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³

為體現「維持現狀」的方針，中國政府對香港採取了具體的措施：